

# 美国博物馆藏品体系建构研究

## ——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书画收藏为例

The Formation of Collection in U.S. Museums: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ollection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鲁阳堃

Lu Yangkun

(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 6063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60637)

**内容提要:** 藏品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 建立和完善藏品体系不仅是博物馆的重要工作, 更是博物馆发展的重要基础。回顾美国博物馆中国书画的收藏历史, 笔者发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以收藏中国书画而闻名的博物馆中异军突起, 在短期内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中国书画藏品体系, 为研究美国博物馆藏品体系建构工作提供了有益范本。本文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收藏政策、购藏途径、工作体系三个方面对藏品体系建构工作展开叙述, 并对如何借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书画收藏经验做出简要分析。

**关键词:** 美国博物馆 藏品构建 中国书画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Abstract:** Collections are the foundation of museums. Build and expand collections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every museum's working tas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Met) forms the most compressive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ol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short period and provides a valuable model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of a museum collection system. This essay begins to introduc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ollections at the Met and then goes on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of its collection from the museum's collection policies, collection methods, as well as working systems. Finally, this essay concludes with a brief discussion of how museums in China could use experience from the Met to build their collection systems.

**Key Words:** U.S. museums; collections;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Met)

藏品是博物馆整体工作的基础和核心, 博物馆举办的展览、学术活动、社教活动都是在馆藏的基

础上展开的。美国博物馆藏品丰富、种类繁多, 在藏品体系建设中注重收藏门类的多元化和整体性,

各个博物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品体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以下简称大都会）、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 &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等都具有数量丰富的中国书画收藏。

美国博物馆收藏中国书画的历史起源于19世纪末。波士顿美术馆和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是最早开始收藏中国古代绘画的两家机构，这两家美术馆的中国书画收藏在初始阶段都呈现出对“日本的渠道资源及日本鉴藏传统的依赖”<sup>[1]</sup>。其中，由于波士顿与日本密切的贸易联系，波士顿美术馆在1890年就成立了日本美术部（今为东方部），并开始了中国和日本绘画的收藏。弗利尔与赛克勒美术馆是美国第一个专注于亚洲艺术的博物馆，由实业家查尔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私人捐建并捐赠个人藏品，该馆所藏中国古画多达1200余幅，数量为美国之最。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的建立要归功于两所博物馆杰出的馆长兼研究员——李雪曼（Sherman Lee）和希克曼（Laurence Sickman）。多年来，他们以一种良性竞争的方式建立起各自博物馆的中国古代绘画藏品体系<sup>[2]</sup>。李雪曼于1952年就任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东方艺术首席业务主管，并在1958年成为馆长。二战以后中国社会动荡，私人藏品流动很快，他抓住了这一机遇，使该馆的中国绘画收藏有了较大规模的增长。建立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中国书画收藏的核心人物希克曼在20世纪40年代使该馆中国艺术品收藏快速增长。由于博物馆所在地区的工业利润在二战后急剧减少，缺乏新的资金和赞助，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在后来的藏品争夺战中一直处于劣势。在美国以收藏中国书画著称的博物馆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都会。该馆虽然在1915年就成立了远东部，但是中国书画藏品在20世纪70年代前一直处于缓慢增长期，其藏品规模和质量远不及美国其他几所以收藏中国书画著称的博物馆。20世纪70年代后，经过收藏家、赞助

人和部门主管的不懈努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美国博物馆中最完善的中国书画藏品体系。与其他几所博物馆历经数十年才建立起来的中国书画藏品体系相比，大都会的过程似乎要顺利许多。众所周知，自方闻（Wen Fong）担任大都会亚洲艺术部主任后就积极拓展该馆的中国书画收藏，并奠定了大都会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地位。

本文的目的不是从艺术史研究的视角对大都会的中国书画藏品进行个案研究，也不是要对方闻在大都会亚洲艺术部发展中作出的杰出成就展开综述，而是更关注于从博物馆学（Museum Studies）的角度对大都会中国书画藏品体系形成原因进行探讨。大都会和其他几所以收藏中国书画而著称的博物馆的藏品形成过程的对比，引发了笔者的一些思考：仅仅凭借一位杰出的部门主任或策展人就可以成就一所博物馆或一个收藏门类庞大的藏品体系吗？大都会中国书画藏品体系的建立和该馆严格而周密的收藏政策有着哪些关系？其他博物馆中国书画藏品体系建立都和20世纪初期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和艺术市场有着密切关系，为什么大都会可以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如此规模的中国书画藏品体系？为了解决这些疑问，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 一、大都会中国书画收藏历史简述

### （一）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书画收藏

大都会的中国艺术收藏始于1879年，在近13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几个重要发展时期。1879年，大都会从艺术品经纪人塞缪尔·阿维瑞（Samuel Avery）手中购得约1300件中国和日本的瓷器，也成为东亚艺术品入藏大都会的开端。1912年，大都会聘请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为研究员。1915年，大都会正式成立远东艺术部。福开森就任期间，除了于1924年负责购藏青铜禁器组外，他组织购藏的书画作品普遍受到质疑，至今未能在展厅展出，最终与大都会的合作不欢而散。1928年，普艾伦（Alan Priest）担任远东艺术部主任，不过普艾伦的“口碑好像并不太好，因为这位负责人搞不清藏品的具体年

代和属性，有时在博物馆刊物上又发表一些不知所谓的评论”<sup>[5]</sup>。1946年，他以30万美元的价格购入画商白威廉（A. W. Bahr）手中的142件中国绘画作品。经过鉴定，这些作品中除了大理国《维摩诘经卷》和周东脚的《鱼乐图卷》尚可观外，大部分都是无法展出的赝品。普艾伦于1963年因达到任职年龄上限而退休。在其他美国博物馆充分利用市场的流动性不断扩大各自的中国书画收藏的时候，大都会却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

## （二）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中国书画收藏

这一切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转机。步入1970年，大都会中国艺术收藏，尤其是书画收藏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sup>[6]</sup>。中国艺术在大都会的振兴源于时任董事会主席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和馆长托马斯·霍温（Thomas Hoving）对博物馆阶段性发展的重新思考和定位，他们清晰地意识到亚洲艺术是当时整个博物馆最薄弱的环节。当时的远东艺术部（1986年更名为亚洲艺术部）只有一间展示中国早期雕塑的展厅和大厅四周展示中国瓷器的橱窗。他们对博物馆是把重点放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而放弃那些薄弱的领域，还是应该回归到创立之初提出的“广泛收藏”的目标展开了讨论<sup>[5]</sup>。狄龙认识到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日益增长，博物馆应该重点发展亚洲艺术，并决定亲身参与到亚洲艺术部的建设当中<sup>[6]</sup>。在庆祝大都会百年诞辰后的第二年，霍温决定聘请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时任普林斯顿大学美术史系教授的方闻为大都会的特别顾问，负责拓展艺术品收藏并重新规划亚洲艺术部的未来发展方向。亚洲艺术部能收获如此大规模的中国书画收藏，并使大都会获得“重要的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盛誉，与狄龙和霍温提出建立成为“百科全书式”博物馆的发展目标有着密切关系<sup>[7]</sup>。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都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点收藏流传在美国重要私人藏家手中的中国书画藏品。大都会在短期内构建起规模庞大、质量上乘的中国书画收藏，成为西方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亚洲艺术展示空间，实现了大都会致力于广泛收藏世界各地杰出艺术作品的使命，也与方闻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坚

毅、耐心和乐观的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sup>[8]</sup>。当然，博物馆庞大藏品体系的建构也离不开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大都会成熟的藏品体系构建方法在中国书画藏品征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二、大都会中国书画藏品体系的构建

### （一）收藏政策

大都会注重根据其自身的使命建立独具特色的藏品体系，艺术品在正式纳入博物馆藏品前要通过严格的审核。以下四个方面是大都会考量中国书画作品是否适合纳入馆藏的依据。

#### 1. 艺术品的真伪与学术研究价值

艺术品的真伪和学术研究价值是衡量艺术品纳入馆藏的主要参考条件，即将进入馆藏的艺术品往往要经过部门主管和策展人的多次论证。大都会的馆藏管理政策中明确要求，提出收藏要求的策展人要为推荐收藏的艺术品撰写详细报告，董事会根据报告内容谨慎做出购藏的决定。博物馆会在收购前严格研究艺术品的出处和相关资料，主要包括艺术品的所有权、所属国家和时间、展览记录、出版记录和是否有被盗记录，等等<sup>[9]</sup>。

#### 2. 艺术品相关学术资料的丰富性

艺术品相关的资料丰富程度也是选择藏品的重要依据。收藏艺术品时如果可以连同创作手稿和其他相关资料一起收藏进博物馆，将提升这件作品的研究价值，在书画展陈中连同创作手稿一起陈列也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时代背景、解析艺术家的创作历程，有出版和展览记录的藏品往往比一般藏品更具有收藏价值，资料越丰富的艺术品博物馆越可以优先考虑购藏。

#### 3. 艺术品牵涉的法律问题

大都会作品收购必须遵循地方、州、联邦政府的法律要求，尤其是涉及艺术品所有权和其他国家法律问题时会十分谨慎。在大都会的藏品征集体系中，《国家被盗财产法》（National Stolen Property

Act)、《文化财产实施法公约》(Convention on Cultural Property Implementation Act)等法律和美国境外资产管理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颁布的法案和公约都是博物馆在藏品甄选中必须遵守的法律条文。这些法律条文对收藏工作中可能牵涉到的法律问题做出明确的解释,遵循这些法规可以有效杜绝不符合收藏要求的中国书画作品进入博物馆。

#### 4. 艺术品与博物馆的学术定位

博物馆在建馆之初都会制定使命和运营目标。在博物馆的实际运营中,董事会成员、馆长和部门主管都会遵循博物馆既定的使命展开工作。2015年,大都会的受托人重申了博物馆的使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集、研究、保存和展示跨越所有时代和文化的重要艺术作品,以将人们与创造力、知识和思想联系起来。”在藏品征集工作中,策展人会根据博物馆的学术定位选择适合的艺术品,也会依据博物馆的定位对有捐赠意向的艺术家和收藏家提供的作品进行甄选。

### (二) 购藏途径

大都会中国书画藏品的主要购藏途径包括基金会出资购买、收藏家和团体捐赠、出售或交换现有藏品三种主要途径。

#### 1. 基金会出资购买

基金会出资购买是大都会获得书画藏品的主要方式。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大多数都经过多个藏家的收藏和转手,出资从收藏家手中直接购买是获取藏品最直接的方法。20世纪70年代起,狄龙曾捐款上千万美元,并鼓励纽约地区对中国书画感兴趣的人士捐款支持大都会购买藏品。自方闻主持并由狄龙基金会出资收购王季迁的宋元绘画后,又陆续购买了让-皮埃尔·杜博斯科(Jean-Pierre Dubosc)和约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等藏家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屈鼎《夏山图卷》、韩幹《照夜白图卷》、宋徽宗《竹禽图卷》、锺绍京《楷书灵飞经册》等重要藏品都是通过基金会出资购买入藏大都会的。

#### 2. 收藏家和团体捐赠或遗赠

收藏家和艺术家的捐赠也是博物馆获得藏品的重要来源。1984年在狄龙的努力促成下,顾洛阜(John M. Crawford Jr.)把收藏的米芾《草书吴江舟中诗卷》、郭熙《树色平远》、黄庭坚《廉颇蔺相如传》等中国书画作品捐赠给大都会。随后,安思远收藏的19及20世纪中国绘画,唐炳源(Tang Ping Yuan)和温金美(P. Y. and Kimay Wen Tang)家族、唐骝千(Oscar L. Tang)家族、翁万戈家族的中国书画收藏都陆续进入大都会。2005年,林语堂的子女把父母生前收藏的43件中国近现代书画捐赠给博物馆,其中包括张大千、徐悲鸿和其他一些书法家的作品。2016年,唐骝千把此前寄藏在大都会,原王季迁收藏的董源《溪岸图》正式捐赠给该馆,为中国绘画收藏又添一笔重彩。方闻就任亚洲艺术部主任之初就做出了尽可能对收藏家藏品进行整体收藏的决定,这种成批收藏的方式帮助大都会以较快的速度获得了大批具有较高质量的中国书画藏品,为日后围绕藏品展开学术研究和策划展览提供了珍贵资料。

#### 3. 出售或交换现有藏品

除了上述购藏途径外,大都会允许以出售或交换藏品的方式处理现有藏品(Deaccession),以获得更充足的收藏经费促进博物馆发展。这种制度有利于博物馆完善藏品,出售没有展览价值或者不在其宗旨范围内的艺术品可以帮助博物馆获得更多的收藏资金并获得以前没有纳入收藏的更重要的作品。大都会对出售或交换的藏品选择标准包括:

- (1) 该藏品无益于进一步推进博物馆的使命;
- (2) 该藏品是多余或重复的,不需要用它进行学术研究;
- (3) 该藏品的质量低于已经收藏或即将收藏的同类型藏品;
- (4) 该藏品缺乏足够重要的美学价值或历史价值;
- (5) 法院判定博物馆将该藏品归还其原合法所有人;

(6) 博物馆无法对该藏品的保管负责<sup>[10]</sup>。

例如, 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对美国博物馆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经济下滑导致很多捐赠者无法捐款支持博物馆的发展。据资料显示, 大都会的捐赠额在2008—2009年间同比减少了24%; 同时, 营业赤字从2008财年的190万美元增加到2009财年的840万美元, 博物馆会员减少了近10%, 总收入减少了20%, 负债增加了22%<sup>[11]</sup>。在财政日益困难的情况下, 2016年大都会从馆藏中挑选了501件瓷器委托纽约佳士得拍卖, 这批拍卖的瓷器都是博物馆已有的重复藏品或不符合瓷器收藏标准的作品<sup>[12]</sup>, 这些瓷器的拍卖所得让博物馆获得更充足的收藏经费。

### (三) 工作体系

藏品征集工作是博物馆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都会的组织结构、管理方法、工作体系都与我国博物馆有诸多不同, 在藏品征集工作中体现的较为明显,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策展人责任制

策展人责任制在日常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论是购买或是捐赠, 博物馆都有一套完整的工作流程, 对藏品进入博物馆的每个环节做出明确规定, 而策展人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每个部门的策展人会根据部门的研究方向筛选希望博物馆购藏的艺术品, 并撰写申请报告提交部门主管、馆长和董事会审核。亚洲艺术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组织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收藏和捐赠, 将几乎美国重要私人藏家手中的所有中国书画藏品尽数纳入藏品体系。这些成果离不开策展人责任制在藏品征集工作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 2. 藏品征集和审核政策

大都会遵循严格的藏品征集政策, 依据收购艺术品的价值由不同级别的管理者审核和批准购藏计划。按照大都会《藏品管理办法》(Collections Management Policy)的规定, 购买单件价值在25000美元以下的艺术品可由部门主管单独授权。购买单

件超过25000美元但不超过75000美元的艺术品可由部门主管在获得馆长事先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单件艺术品超过75000美元, 但不超过150000美元, 可由部门主管在获得董事和收购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Acquisitions Committee)的批准后进行<sup>[13]</sup>。大都会对即将进入馆藏的捐赠和遗赠也有着规范的程序。策展人要对捐赠的艺术品撰写详细的报告, 先经部门主任审核, 然后递交馆长, 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是否接受捐赠。在大都会, 馆长有权在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12月会议后至12月31日期间接受捐赠, 这些捐赠被称为“年终捐赠(Year-End Gifts)”, 这部分经馆长同意的捐赠会在次年1月的会议上向董事会报告。此外, 馆长有权在6月执行委员会之后到9月理事会(Board of Trustees)会议之前接受捐赠, 这些捐赠称为“夏季捐赠(Summer Gifts)”, 并在9月的董事会议上报告<sup>[14]</sup>。

#### 3. 艺术品鉴定和评估机制

大都会的长期政策是不向捐赠者提供鉴定和评估服务。美国相关管理机构强调, 因为参与艺术品评估和博物馆受赠人的角色有冲突, 博物馆不能承担艺术品的鉴定工作。大都会规定, 如果捐赠者要求寻找鉴定人或者博物馆论证艺术品的真伪, 馆长可以提议几位符合资质的鉴定人, 包括艺术品经销商和拍卖行等第三方机构, 但博物馆方不能安排评估, 也不能向鉴定人支付评估费用。如果鉴定方提出要求, 博物馆方应提供作品原件、作品图和博物馆档案中有关艺术品的细节信息<sup>[15]</sup>。

#### 4. 员工管理模式

大都会不允许员工在捐赠和购买艺术品中担任交易商, 员工也不得利用其工作的影响力在艺术品交易中谋取私利。雇员不得接受任何艺术品收藏家、交易商、艺术家的聘请, 除非事先由馆长咨询律师并获得书面许可文件。员工在接受博物馆相关活动的任何礼物之前, 必须获得其部门主管的书面同意, 如果礼物是博物馆收藏级别的高质量艺术品, 必须征得馆长的同意才能接收。

表1 2017年和2018年大都会藏品收购资金配额  
(单位: 美元)

项目	2017年	2018年
捐赠	14,291,000	58,928,000
长期固定投资收入	9,672,000	21,676,000
保险及艺术品销售	1,544,000	8,877,000

在大都会的管理体系中, 员工允许接受的礼物的价值应少于150美元, 而且不允许接受现金。除与金融服务实体签订的标准商业协议外, 禁止员工与博物馆相关的任何艺术家、经销商、受托人、捐赠人、收藏家或服务供应商进行任何类型的交易<sup>[6]</sup>。

### 5. 收藏经费来源

大都会的藏品收购资金来源包括捐赠(包括现金和证券)、博物馆长期固定投资收入、保险获得及艺术品销售三大部分<sup>[7]</sup>。大都会2017年、2018年年度报告公布的用于藏品收购的资金分别为2551万美元和8948万美元, 其中这三部分的配额如表1。

捐赠是大都会的重要资金来源, 该馆中国书画作品的很多艺术品收藏资金都来自个人和基金会捐赠。其中,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狄龙曾个人捐赠2000万美元, 并筹集1亿美元给大都会用作亚洲艺术部的筹建经费。大都会提倡捐赠行为并对捐赠者给予各种奖励, 每年出版的年报都会列出当年对博物馆做出贡献者的名单, 直接捐赠艺术品和捐款支持博物馆收藏的捐赠者都会列出姓名以鼓励捐赠行为。大都会还会以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捐赠人的名字命名展厅。比如, 亚洲部的狄龙展厅(Dillon Gallery)、王季迁家族展厅(C. C. Wang Family Gallery), 等等。另外, 博物馆会利用历年捐款成立基金会, 基金会每年稳定的收益也支持博物馆日常运营和藏品收藏工作的开展。

## 二、大都会中国书画藏品体系建构的启示

博物馆是展示人类文明和促进文化交流场所, 在社会公益性文化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藏品作为

博物馆存在的物质基础, 是开展一系列活动的根本保障。我国现有博物馆已超过5000家, 40年来博物馆数量增长了14倍, 并且正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2018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激发博物馆创新活力”的要求, 以此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 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sup>[8]</sup>。

我国博物馆飞速发展的局面, 既给博物馆藏品建设带来了机遇, 也提出了挑战, 如何尽快建立起具有特色的馆藏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大都会作为美国规模最大的博物馆, 其中国书画藏品体系构建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必然性, 但也是在美国博物馆管理制度下获得高质量馆藏的典范。我国博物馆各方面与美国不尽相同, 这种藏品体系构建模式在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博物馆能否适用还有待于检验。但“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大都会成功的收藏经验确实为博物馆藏品体系建设工作提供了有益范本, 许多做法对我国博物馆藏品体系构建的具有启示意义。

### (一) 明确博物馆的学术定位

大都会在建馆之初就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实际情况明确学术定位, 并根据定位选取重点收藏领域逐步积累形成藏品体系。大都会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书画藏品的振兴自然离不开方闻的努力, 但是更重要的是狄龙和霍温决定把博物馆的工作重心转移至“亚洲艺术部”的振兴, 并给予政策和资金的全面支持。博物馆自身的学术定位和发展方向也就是博物馆的个性特色。有了明确的学术定位, 博物馆在藏品征集和甄选过程中可以更加有针对性, 有的放矢地选取符合博物馆需求、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作品纳入馆藏。

### (二) 注重藏品的高效利用

在藏品进入大都会后, 大都会会有效利用进入博物馆的藏品并开展展览、公共教育等种类丰富的活动, 让藏品最大限度地显现其自身价值。通过在官方网站发布馆藏作品的高清图和详细信息, 学者可以在线查询藏品信息, 延展了藏品在学术研究中的利用价

值。另外，藏品进入馆藏后博物馆会及时组织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究，举办展览并开展一系列学术讲座和交流活动，将藏品资源的效益最大化。这样的做法也使潜在的捐赠者体会到捐赠博物馆才是个人收藏最好的文化归宿，从而带动更多的捐赠行为。

### （三）培养公众支持博物馆的意识

收藏家和团体捐赠成为大都会中国书画藏品的主要来源，这源于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支持博物馆发展的风气，很多收藏家愿意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珍贵收藏捐献给博物馆，参与捐赠的收藏家也会

得到博物馆各种奖励，这种博物馆与收藏家之间的互动形成良性循环并带动更多藏家捐赠藏品。具有经济实力的个人或团体也愿意直接出资支持博物馆开展藏品体系建设和其他各项工作，博物馆利用他们的捐赠资金成立基金会以支持未来的发展。随着中国书画作品价格的不断攀升，博物馆从市场上购买书画作品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更凸显了捐赠人在博物馆收藏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依靠捐赠人的支持逐步形成的稳定资金流，构建起了美国博物馆具有可持续性的藏品构建模式。

#### 注释

- [1] James Cahill.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in U.S. Museums: An Insider's View, <https://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cahill-lectures-and-papers/390-clp-199-early-chinese-paintings-in-us-museums-an-insiders-view>.
- [2] James Cahill. Early Chinese Paintings in U.S. Museums: An Insider's View, <https://jamescahill.info/the-writings-of-james-cahill/cahill-lectures-and-papers/390-clp-199-early-chinese-paintings-in-us-museums-an-insiders-view>.
- [3] 谈晟广：《1973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如何开始建立世界一流的中国古画收藏》，《中国书画》2017年第8期。
- [4] 孙志新：《历史与实践：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艺术收藏》，《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
- [5] 何慕文、尹彤云：《方闻与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收藏》，《西北美术》2016年第2期。
- [6] Maxwell Hearn. Asian Ar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2015(1): 28.
- [7] 何慕文、尹彤云：《方闻与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收藏》，《西北美术》2016年第2期。
- [8] Maxwell Hearn. Wen C. Fong and The Asian Art Department a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rientalia*, 2006(2): 40-46.
- [9]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资料：<https://www.metmuseum.org/about-the-met/policies-and-documents/collections-management-policy>。
- [10]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资料：<https://www.metmuseum.org/about-the-met/policies-and-documents/collections-management-policy>。
- [11]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ne Hundred Thirty-ni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Trustees for the Fiscal Year July 1, 2008, through June 30, 2009: 50-52.
- [12] 刘婷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处理”中国瓷器为哪般？》，《艺术市场》2016年第31期。
- [13]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资料：<https://www.metmuseum.org/about-the-met/policies-and-documents/collections-management-policy>。
- [14]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资料：<https://www.metmuseum.org/about-the-met/policies-and-documents/collections-management-policy>。
- [15]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资料：<https://www.metmuseum.org/about-the-met/policies-and-documents/collections-management-policy>。
- [16]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官方资料：<https://www.metmuseum.org/about-the-met/policies-and-documents/collections-management-policy>。
- [17]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One Hundred Thirty-ni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Trustees for the Fiscal Year July 1, 2017, through June 30, 2018: 56.
- [18] 《刘玉珠在上海重庆调研督导〈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贯彻落实工作》，《中国博物馆通讯》2018年第11期。